

山西闻喜上郭遗址出土仰韶时期石雕蚕蛹和春秋早期陶范



H3出土的陶尖底瓶、夹砂罐



H29出土石钺

H50出土石雕蚕蛹



T172、③层等遗迹中出土陶范

上郭古城和邱家庄墓群,位于山西省闻喜县城东南,澧水河在其西部,20世纪70年代起,在邱家庄、上郭村一带的鸣条岗上,考古工作者陆续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出土“荀侯”匾、“贾子”匾、“别人守囿”挽车等珍贵文物。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公布“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至今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对晋文化深入研究意义重大。2018、2019年清理邱家庄M5001,2020年调查发现上郭古城的形状、面积,2021年配合山西省文物局首届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的举办,发掘位于古城西北角面积250平方米的居住区,发现了仰韶和周代两个时期的遗存,特别是出土春秋早期60多块陶范及铜炼渣、雕刻刀具和大量的板瓦、筒瓦、瓦当,表明这是一处两周时期包含有城址及墓地的大型遗址群。

今年3月23日至6月23日,举办了第二届2022年田野考古技术培训,来自全省各地市及省直文博系统单位的18位学员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培训。发掘地点选在紧邻2021年探方之西、之北,发掘500平方米,发现了各类遗迹现象有灰沟2条、灰坑56座(包括仰韶时代的7座房址)、灶址2个,出土陶范1044、陶器183、玉器14、石器157、骨器123、小铜器4、铜炼渣7、贝类46、铁器2、蛋壳4、果核1件,共计1585件。这次发掘进一步确定了上郭遗址主要有两个时期,即仰韶时代中晚期和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仰韶时代中晚期,以2021年清理的10座圆形半地穴式房址为主(按灰坑编号),年代包括西阴文化和仰韶晚期。H3,口呈不规则椭圆形,周壁自口部向外扩张至底部,袋形,壁面较整齐,平底,底面中间有不规则椭圆形踩踏硬面。口部东西长径202、南北短径160,底部近圆,东西长径270、南北短径250、深100厘米,硬面东西长径110、南北短径100厘米,东、北紧邻坑壁有尖底瓶、夹砂罐等能够复原的陶器多件,属西阴文化时期。另外,属这一时期的还有大部分在探方外H29,清理范围内已经出土两件大型石钺。H29③:2长28.5、宽23厘米;H29③:3长25、宽18.5厘米。

H50,口呈不规则圆形,周壁自口部向外扩张至底部,呈袋形,坑底平整,壁面较粗糙但经修整。口部东西长径260、南北短径200厘米,底部东西长径280、南北短径220、深130厘米。从出土口沿外有一周附加堆纹的红陶夹砂罐、白衣彩陶钵、蓝纹尖底瓶腹片等陶片看,属于仰韶晚期偏早阶段,约为距今5200年前后。坑内分四层堆积,在①层里出土一枚石雕蚕蛹。这枚蚕蛹,不排除是更早的西阴文化混入仰韶晚期的。但无论哪一种存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26年李济先生在上郭西略偏南10余公里的夏县西阴村西阴文化发现一枚蚕蛹,有学者提出质疑,后来1960年芮城西王村出土一件仰韶文化晚期的“蛹形陶饰”,2019、2020、2021年,山西夏县师村出土5枚石雕蚕蛹和一枚陶制蚕蛹,现在上郭也出土了,说明山西南部澧水河流域,仰韶文化已经养蚕,而且蚕蛹、蚕茧传承有序,也坐实了西阴遗址蚕茧的可信度。其实,1927年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址的发掘》中,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说:“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当我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我知道这意义很重大,就非常注意这件事。但是我没找着第二个。”“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较之安特生所说的陶器与陶器尤为可靠。”

上郭这枚石雕蚕蛹,再现了五千多年的山西文明史。进一步从西阴村、师村、上郭、西王村等典型遗址入手,来自华北平原的枣园文化后来发展为北撤、东庄、师村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与黄土高原渭水流域的半坡文化前身北首岭遗存和半坡文化,在山西南部长期对峙、碰撞、交流,从而产生一支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即西阴文化(庙底沟文化)。以这个课题为抓手,以蚕茧、蚕蛹组成的丝织业为突破口,结合烧石、食盐、铜矿、铁矿等优渥的自然条件和特征鲜明的玫瑰花纹彩陶,来研究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西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已经水到渠成。

山西南部先秦时期存在发达的丝织业。绛县横水西周晋国墓地出土的丝织品“荒帷”即棺罩,是对死者生前居室帷幔的模仿;而《诗经·唐风·扬之水》是两周时期晋国的诗歌作品,穿在年轻女子身上的“素衣”“朱褙”“朱绣”都是丝织品;同时期魏国的《诗经·魏风·十亩之间》有“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之句,生动地记述了青年女性在桑林里欢欢喜喜采桑的情景。

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以春秋早期为主,除发现大量大型板瓦、筒瓦和瓦当说明附近一定有大型建筑外,两年间陶范集中发现相邻的四个探方中,今年以T17②、③层出土最多,出土遗物可辨器形有陶鬲、盆、罐、豆、甗、板瓦、器盖、器底及果核、骨器、石器、骨笄、鱼骨、陶环、圆陶片、陶球、玉环、砺石等,陶范除带纹饰陶范130件外,其余为素面,可见铜鼎、簋、钟等礼、乐器范,也有铜铍、节约等武器、车马器范,纹饰有凤鸟纹、夔龙纹、瓦楞纹、弦纹等,另炉壁、铜炼渣、烧土块等时有出土。

在2021年断定上郭古城可能是晋国重要都邑“古曲沃”的基础上,今年发掘出土的一千余块陶范和与铸铜作坊有关的遗物,无不表明这座古城肯定就是“古曲沃”,“曲沃代翼”、晋献公兼邻国“骊姬之乱”和晋文公开辟晋国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霸业等,都与此息息相关,这在晋文化研究史上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上郭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已获得材料正在整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田建文 王金平)

海南文昌清澜港出水遗物点调查



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清澜港位于海南本岛东北部,文昌市东南部,与七洲列岛遥遥相望。港内北部是八门湾,有文教河、文昌河从湾东西两侧流入,港域狭长,南北长约5海里,宽约0.2至0.3海里,港内水深6.35米。潮汐通道东侧有岸线5500米,基本处于天然状态,西侧有岸线3500米,已占用岸线1500米。清澜港作为一个泻湖型的天然良港,港内几乎没有风浪,淤泥也比较少,自然条件极其优越。

清澜港素有“琼州之肘腋”“文昌之咽喉”的美称,地处重要的海上航线节点,明代曾在此设清澜守御所,后改成“清澜”,海湾因此而得名。清澜港建港至今已600多年的历史,据《方輿纪要·卷105·文昌县》记载:“清澜港”在县东南三十里。源出县下场溪西,二处合流,至此与海潮相会而成港。明置千户所于此。明洪武元年(1368年),形成自然的渔商小港,时称“陈家港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在安知乡青蓝都(今“清澜”的谐音)建造青蓝守御所。清康熙元年(1662年),青蓝所城被大水冲塌,修葺后改为青蓝巡司驻署。

如今,清澜港作为国家一级开放口岸港口,海南第二大渔港,是海南“四方五港”重要港口之一,集商、渔、军、公务等综合性于一体,是连接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重要枢纽,同时也是三沙市后方补给基地和文昌航天发射中心的中转枢纽。

调查经过

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海南水下文物专项调查时,调查队根据走访当地渔民所获线索,曾对位于清澜港门外侧的线索地点进行了潜水探摸,但因能见度低,水流急、涌浪大,经过4天12潜次的探摸,仍未能确认沉船遗址的准确位置。2010年,海南省文物局组织水下考古队对该地点进行了复查。2012年,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地点及其周边海域滩涂又进行了调查勘探。2021-2022年,为配合海南本岛东部传统航线调查项目,又再次对该海域进行了走访复查。



海底埋藏

出水遗物点海域水深仅3~4米,海底均为淤泥沙,能见度极低。该地点恰处在清澜港的港门,外为大海,内是港湾,如同口袋的袋口,因此潮汐涨落明显,水流流速较大。其水浅处受涌浪拍打,水手队员来回摇晃影响了探摸效率。经反复搜寻,未能发现沉船船体构件或凝结物。从出水遗物看,器类单一关联,符合沉船船货特征;器型完整,釉色完好,基本没有珊瑚胶结,磨蚀程度较轻,符合泥沙埋藏特征。由此推测,沉船船体可能埋藏于海底以下。该遗物点地处港门,水流急迫,小件器物搬运距离较远,故沉船位置与遗物出水点有一定距离,下一步须结合物理探测扩大搜寻范围。

出水文物

该地点(WCQLS:1),共收集到青花瓷器10件。其中,碗8件,盘1件,碟1件。碗分5型。A型,3件。QLS1:01,敞口,折沿,深弧腹,圈足,口沿内外、内外底分饰弦纹,内底及外壁描绘写意花草。B型,2件。QLS1:04,敞口,浅斜腹,圈足有鸡心点,内底一圈莲瓣纹,中绘法螺,四壁符号纹。C型,1件。QLS1:06,器型小,敞口,折沿,内底饰鸳鸯莲池,构图饱满。钴料呈色较其他发黑。D型,1件。QLS1:07,直口,深弧腹,内底绘11道弦纹组成的漩涡纹,内外壁绘缠枝花草。E型,1件。QLS1:08,涩溜,内底方圆形。盘1件。QLS1:09,蓝釉,涩溜,内底脱釉,内壁施蓝釉,外壁饰青花花草纹。碟1件。QLS1:10,方形,葵口,内壁饰青花仙鹤。另有釉陶器盖1件,脱釉,桥型钮,捏成。

窑口与年代

这批青花瓷器,胎薄、火候高,釉白、钴料发色纯正,内外满釉,多弦纹装饰。经对比判断,其为明代晚期福建漳州窑产品。其中,A型、B型碗,在漳州诏安秀篆窑址中有同类器出土,D型碗在安溪窑中有同类器出土。蓝釉盘与平和五寨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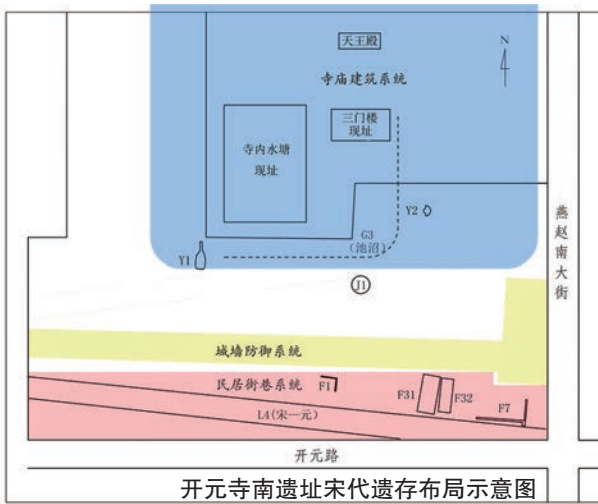
土蓝釉器类似。整体上,这批瓷器年代应在明万历前后。

清澜港位于海南本岛东北部,地理位置重要,这一天然良港最晚在宋代时已见于史料记载。作为一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交通航线上的重要节点,靠泊、补给、贸易、中转,不一而足。清澜港遗物点的历次调查和所获出水文物,为研究这一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由于作业海域的恶劣海况,我们始终未能确认沉船遗址的准确位置。为慎重起见,暂命名为清澜港沉船遗物点。从出水器物本身而言,均是青花瓷器,产地窑口一致,为明晚期福建漳州窑产品,非海南本地窑口,且有同类器型。应该说,出水瓷器的特征明确,应是由海路而来,是一条沉船的船货。综合该地点的水文海况,我们初步认为,渔民提供的线索点不是沉船沉没即沉船遗址形成的原生地点。水流、涌浪,尤其大的台风可能使船货散落搬运了相当的距离。清澜港内的八门湾有文昌、文教、横山等八大河流注入,带来了丰富的泥沙,沉积速率快,很可能将沉船掩埋于海底。这批瓷器,保存完好,釉色清亮,比南海诸岛珊瑚砂底埋藏环境中保存的器物品相好很多,说明其长期埋于泥沙,隔绝空气和海水,处于厌氧状态,氧化慢。笔者推测,很可能是在大的台风搅动水流后才部分出露于海底。因此,该地点探摸发现的难度很大,下一步还要扩大范围,并利用物理探测手段进行。

同样在文昌市境内,清澜港东北的铜鼓岭脚下宝陵港早在1990年代即发现了一处南明时期(清初)的沉船遗址,出水了大量铜锣、铜钱、瓷器,包括较多的永历通宝。清澜港遗物点的年代大致在明晚清之际,与宝陵港沉船同属一个时代。明晚期隆庆开海禁之后,我国海上对外贸易交往迎来了继南宋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在这一时代刻度内,相继发现了汕头南澳1号,文昌宝陵港1号、清澜港遗物点,西沙北礁III号遗址和遗物点。以上几处同时代的沉船地点,以点连线,串联起明代晚期南海北部海区的历史性航线。航点与航线,驿站与航路,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材料。

【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陈明华 李钊】

河北开元寺南遗址一处宋代房址内出土医药相关文物



开元寺南遗址位于河北正定,是一处时代跨越唐宋明清的古今重叠型城市遗址。自2015年以来经历了持续六年的考古工作,不仅发现了城墙防御系统、寺庙建筑系统,还发现了大量与古代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遗迹遗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遗址中发现的一处宋代房址出土了和医药有关的文物。

房址编号为F1,位于发掘区南侧的宋代民居密集区,地理位置优越,南临东西向道路L4,东距南北向中心大街不足百米,北侧则是已经废弃的子城北墙。房址的南侧和西侧因为被隔梁梁压暂未清理,清理部分南北长6米,东西宽4.5米,门向不明。该房址是地面式建筑,上部破坏严重,仅残留墙基与室内踩踏面部分。墙基用残砖和土坯砌筑而成,室内的踩踏面十分坚硬,表明房址使用时间较长。室内偏东部有一处灶址,室内地面上还发现散乱的墙皮碎块。在房址内集中出土了一组保存相对完整的文物,包括绿釉陶枕、陶壶、小型白釉执壶、瓷白、瓷盒,其中的一件绿釉陶枕尤为精致。这件陶枕为泥质红陶胎,胎质细腻坚硬,器表施绿色釉,底部无釉。枕面呈方形,中间呈弧状下凹,两端上翘。四壁斜内收呈倒梯形,右壁下部有一个圆形气孔,底部有抹角长方形形底台。枕面刻划连枝牡丹纹,四壁模印图案,其中正面为鱼、鸟、植物图案。其余三面均模印鹿衔仙草纹,鹿口衔仙草,站在一株盛开的莲花上,两侧为草木纹。通高8厘米,枕

面8.3×16.5厘米。这件陶枕出土时枕面已经缺角,在废弃前应该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

目前见诸发表的造型相同的瓷(陶)枕尚有两例,一件是1978年通辽市二林场辽墓出土的三彩印花陶枕,前后立面为仙人骑鸟纹,两侧面装饰舞蹈人物纹,通高8.9厘米,枕面8.6×15.5厘米。另一件出土于河北临城县岗头砖厂,为白釉瓷枕,前后立面饰“鱼鹤戏莲图”,与开元寺所见瓷枕纹饰相同,左右侧面饰“鹤戏莲图”,即在“鱼鹤戏莲图”基础上将鱼去掉,通高10.4厘米,枕面10×17.5厘米。这两件瓷(陶)枕与开元寺南遗址所出陶枕时代相同,三者不仅外形一致,在体量、纹饰方面亦有相近之处。在体量上,高度均在10厘米左右,枕面长度均不足20厘米,与现存宋金时期的大量睡枕体量相距甚远。在纹饰方面,不仅侧面的构图模式相近,更是有鸟(鹤)、鱼、莲花、牡丹等共同题材。这些足以说明三者一在功能上具有相同之处。

关于这类体量小的瓷(陶)枕的用途一直存在争议,较具代表性的有明器、睡枕、脉枕三种观点。具体到前面介绍的这三件器物,其中两件有着明确的出土情境,通辽市的三彩陶枕出土于墓葬,正定的陶枕则出土于房址中,因此明器之说不足以明确其用

途,故而更有可能是实用器。这几件在体量上与睡枕的差异则可以说明其功用与睡枕无关,最终的结论指向了脉枕。开元寺南遗址出土的陶枕上,装饰有鹿衔仙草的纹饰,表达的是对健康和长寿的向往,而其他几件瓷(陶)枕上的仙人、鸟(鹤)的题材,也有相似的含义,这也从侧面支持这些瓷(陶)枕的性质为脉枕的结论。与脉枕伴出的陶壶、瓷白以及其余几件小型瓷器也可能与药剂的加工或盛储有关,对这些器物内的残留物目前已经进行取样,有待进一步的分析。(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余俊英 翟鹏飞)

MicroWise System 元智系统 智能恒温恒湿恒氧加湿、除湿、实时查看等功能于一体,能有效调节柜内温湿度,避免对温湿度敏感的物品(如漆木器、纸张及纺织品)发生变形、起霉、褪色、虫蛀及霉变等病症,可有效降低物品的自然损坏率,提升藏品收藏保管能力。